

战斗在“第三线”上的广大华行共产党人

□ 徐 涛

广大华行1933年创办于上海，主要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后来发展为我党隐蔽战线的一处重要据点，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华行迁至重庆，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及海外多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1938年前后，按中共中央指示改组，成为我党在“第三条战线”上的重要载体和党的地下组织创办企业的成功典范。

公司成为党的重要据点

1932年，进步青年卢绪章与田鸣皋、钱兴中3人集资150元法币设立光大行，从事西药及医疗器械邮购业务。不久，卢绪章、田鸣皋又与杨延修、张平、郑栋林等5人合作，接办光大行，并改名为广大华行，继续开展西药、医疗器械的邮购服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广大华行就发展成一家初具规模的西药商行，业务也得到很大发展。

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卢绪章积极参加救国会举办的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成为该会骨干之一。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上海洋行华员中筹建上海洋行华员联合会（简称“洋联”）。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身份，参与“洋联”筹建工作，同年10月“洋联”正式成立。“洋联”经常举办时局形势报告、社会科学及哲学问题讲座，还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义勇军训练。

全面抗战爆发后，卢绪章等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爱国活动，并参加战时服务团，救护伤兵和难民。同时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举办的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不久，卢绪章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也随之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此前后，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委员吴雪之接手领导“华联”和“银联”（华联同乐会、银钱业业务委员会）的党、团工作。不久，他担任广大华行业务主任，任务是为党筹集活动经费。

受战事影响，广大华行经营面临困难，卢绪章等5位创办人决定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点转向西南地区，并于1938年1月设立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当时货物运输困难，广大华行决定开办代客运输业务，并与上海一些公司建立销售代理关系。同时，广大华行正式成立董事会，推举莫其昌为董事长，田鸣皋为总经理，郑栋林为昆明分行经理，卢绪章为上海分行经理。

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滇越铁路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国际通道，广大华行在西南大后方迅速站稳了脚跟。

1939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听取中共江苏省委刘晓、刘长胜汇报后，决定在沪物色干部到大后方建立党的“第三线”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等任务。刘晓和刘长胜经慎重考虑，认为广大华行不仅在上海有多年经营基础和社会基础，经营业绩卓著，而且在西南大后方也有一定的经营实力和社会基础，特别是卢绪章作风稳健，组织领导能力强，是个适合担当地下秘密机构的人选。于是决定派卢绪章去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把它改建为地下党的“第三线”秘密据点，执行特殊任务。当时，卢绪章在上海已被敌特注意，原本决定转移至苏南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正要成行前，吴雪之通知卢绪章，要他去重庆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卢绪章考虑到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向刘晓提出派一名党内政治水平高的同志到广大华行上海分行工作，加强党的力量和沪渝间的联系。上级经过研究，同意由吴雪之到广大华行上海分行任会计主任，便于联系上海与重庆之间的各项工作，在广大华行上海分行期间，与刘长胜单线联系。

生意越做越大，隐蔽条件也越来越好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领导。卢绪章等在大后方广交朋友，积极参与各界的经济合作活动，不仅提高了企业和社会的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40年春，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刘晓、刘长胜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一个商行，由党员负责经营，作为党的特殊机构执行党的特殊任务。同年春夏间，刘长胜指示吴雪之撤出上海广大华行，和廖蔚君、麦文澜筹建一个经纪机构——协鑫号，由吴雪之任总经理。刘晓和刘长胜给吴雪之的主要任务是：一、用党中央拨给江苏省委的一笔专用款作资本，在货币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证不贬值；二、争取多赚钱，提供地下党脱产同志的生活费用和党的其他经费需要；三、掩护部分在沪的重要领导同志；四、锻炼和培养一批党的经济工作干部。

的经济工作干部。

1941年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被日军占领。刘晓立即指示吴雪之以协鑫号总经理的身份随同龚饮冰去香港，将党组织储存在香港的资金购进货物并转移到上海。吴雪之冒着巨大的风险在香港奔走，采购物资和转移资金，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协鑫号几经周折、几经发展，发挥了党的地下经济机构作用，掩护了多名领导同志，并提供给党组织大量的经费。

就在协鑫号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隐蔽条件也越来越好之时，根据形势的需要，刘晓决定吴雪之重返广大华行，由吴雪之任广大华行党支部书记，加强党对广大华行的领导，协助卢绪章主持工作。这时的广大华行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贸易集团。1944年，广大华行又与民生实业公司合作筹办了以进出口贸易、造纸、运销药材、运输和代理买卖、经办地产等为主的民孚企业公司。此后，吴雪之又以投资者的身份参加民孚企业公司，被推为民孚企业公司董事兼任协理。

卢绪章在吴雪之等人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工作，不但与国民党政商界重要人物“打得火热”，取得了国民党少将议的头衔，并利用国民党的关系与盟国甚至沦陷区做生意，运输、经营各种紧缺物资，使广大华行很快变成“资本充裕、后台强硬、商贸网络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大公司，并开展进出口业务，建立、维持了从上海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秘密交通线。通过交通线，广大华行的共产党人将药品、武器等物资秘密运往各大抗日根据地。由于经营有方，广大华行账面利润高达数十万美元，其资金成为中共党组织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抗战时期很多“八办”房产的购入，都是由广大华行提供的资金。

以“资本家”的身份开展工作，守护好党的秘密战线

抗战胜利后，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材料等业务。其间，卢绪章等按上级指示，在积极扩展广大华行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并与民生公司合资成立民安保险公司，先后与人合办万力制药厂、建业民行、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以适应

陈觉和赵云霄：革命伉俪血泪遗书感天地

□ 陈宇箫



有这样一对革命伉俪，他们的事迹因为两封血泪遗书为世人传颂，这两封遗书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一封是就义前丈夫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一封是妻子写给刚出生女儿的遗书。这两封遗书的作者是陈觉和赵云霄。

陈觉，原名陈炳祥，生于湖南醴陵。15岁那年，陈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醴陵县立中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1925年，陈觉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云霄，原名赵凤培，河北阜平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赵云霄、陈觉作为第一批先进的中国青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二人相识相知相爱，结为夫妻。

1927年，赵云霄、陈觉一起回国参加革命。1928年春，作为省委特派员，陈觉参与指挥中共湘东特委和醴陵县委组织的“醴陵年关暴动”。

由于当地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



陈觉像



湖南省长沙市烈士公园展出的陈觉烈士写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

坏，陈觉夫妇被迫离开醴陵，回到省委机关工作。之后，陈觉被派往常德组织湘西特委。已有身孕的赵云霄，留在省委机关负责各地联络工作。

1928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陈觉、赵云霄在常德、长沙分别被敌人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

面对反动当局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陈觉夫妇宁死不屈。多次审讯

未果，反动当局以“策划暴动，图谋不轨”的罪名，判处陈觉、赵云霄死刑。

就义前，在给爱妻的诀别信中，陈觉写道：“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

自身发展和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的需要。

1946年，中共广大华行支部在卢绪章家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卢绪章任支部书记，吴雪之任副书记。根据刘晓安排，广大华行由卢绪章总负责；吴雪之负责对内，遇到问题互相商量解决。

1947年4月，广大华行成立中心制药厂，卢绪章担任总经理，经报组织上批准，特别“邀请”陈果夫担任制药厂的董事长。此外，卢绪章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等企。利用这些人提供的保护，广大华行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向党的“第一线”“第二线”机构和解放区秘密输送了情报、急需物资以及大量经费。

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广大华行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和暗中调查。为防不测，上级指示广大华行党组织紧急撤退到香港，将资金和地下党员集中到香港待命。

广大华行立即停止发展原有各项业务活动，把资金集中于香港使用。卢绪章亲自到香港进行筹备工作，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房地产公司，分别由卢绪章和杨延修任经理。吴雪之随广大华行转移至香港，负责为党筹集经费。广大华行党组织通过不懈努力，在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前，将大部分资金、外币和黄金安全转移到香港。不久，总行也安全转移到了香港，并将资金分批转交给党组织。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临近，中共中央来电指示：因解放区需要大量干部，广大华行除香港外，所有国内外分支机构一律结束。周恩来、任弼时密电香港：香港广大华行仍予保留并与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领导，广大华行的党员干部除舒自清、张平留在香港工作外，其他同志都回来参加接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吴雪之回上海参加接管准备工作，卢绪章等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至此，广大华行完成使命，将积存资金上交党组织，附属企业也先后归并入国家事业。

（摘自2023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协报》）



毛福轩：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支部书记

□ 何立波

毛福轩谱名毛恩梅，1897年4月29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他比毛泽东小4岁，而辈分却高两辈，是毛泽东的族叔祖。时值清朝末期，灾荒连年，少年毛福轩跟随父母亲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沿途乞讨逃荒到南京、江阴一带，投亲靠友以谋生活。辛亥革命爆发后，年仅14岁的毛福轩陪父母回到韶山。

1921年，当24岁的毛福轩听说毛泽东回家乡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时，便产生了想学习的念头。经毛泽东介绍，毛福轩进入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工读期间，毛福轩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自修大学，毛福轩认识了何叔衡、夏明翰、李达等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能帮助穷人“脱除一切痛苦”。这一刻，他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要打破现有的一切不平等。

1922年，在毛泽东的调派下，毛福轩前往江西安源煤矿，协助毛泽民从事工人运动。当时，毛福轩的公开身份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职员，这是一个为减轻工人消费负担而成立的组织。这是毛福轩第一次参与工人运动，初涉的紧张很快就被沉着冷静所取代。他以新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路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底，毛福轩奉调从安源回到韶山，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成为韶山农运的带头人。他走亲访友，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了一批苦大仇深的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经长沙回到故乡韶山，直到8月28日才离开韶山去广州。这一次，他在韶山住了203天，是毛泽东1921年离开韶山后回故乡时间最长的一次。毛泽东回韶山，本来是回来养病的，但没有闲着。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通过创办夜校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7月间，夜校发展到20多所。

从1925年3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

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20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

6月中旬的一天，在毛泽东家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韶山支部成立会议。毛泽东推荐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领读入党誓词，举行鹿叔侃、钟志中、毛新梅、李耿侯等4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

湖南省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韶山支部就此成立，它的秘密代号为“鹿德甫”。韶山党支部成立后，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韶山党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誓言，他们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名垂千古的“韶山五杰”，英雄事迹可歌可泣。自此，毛福轩真正站在了自己所向往的那个新世界的入口，并立志为之奋斗终身。

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支部的正式成立，使韶山农民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摘自2014年第4期《党史博采》）

半部无线电台

□ 傅 强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里，静静躺着半部无线电台模型。这台机器是我军无线侦察事业的起点。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取得龙冈大捷，歼灭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2个旅共9000余人，俘师长张辉瓒，缴获电台1部，并俘虏了王诤、刘寅等无线电台人员10余名。这些人员和电台被送到红军总部，但红军战士出于仇恨把发报机摔坏了，只剩下收报机。毛泽东指示，今后凡缴获到无线电台机器一律不准损坏，直接送总部。而这半部机器更宝

贵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懂得使用机器的人。王诤、刘寅等无线电台人员，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思想很快彻底转变，自愿加入红军，后来成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拓者。他们不仅尽心竭力地侦听敌人的电报，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年轻的红军学员，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骨干。这支新生的通信兵部队从小到大，在历次战斗中屡建奇功。

（摘自2023年4月17日《解放军报》，原标题为《绿色宁都的红色传奇》）

1928年10月14日，陈觉在长沙牺牲。

4个月，赵云霄在狱中诞下一名女婴，取名启明，意为在黑暗中盼望破晓。生下启明仅仅1个多月，赵云霄就要和女儿永别了，她在给女儿的遗书中写道：“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后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辜负你父母的期望。”1929年3月26日，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口奶后，赵云霄毅然走上刑场，牺牲时年仅23岁。

如今，在陈觉的家乡，醴陵市烈士陵园中竖立着这对革命伉俪的雕像，夫妻二人紧紧相依，瞩目前方。醴陵市烈士陵园管理所副所长杨云志告诉记者，“虽然身处和平年代，但我们依然被他们的精神打动”。

（摘自2018年6月3日《人民日报》）